

蘇聯共產黨何以失敗？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蘇聯共產黨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是世界上第一個掌握政權的共產黨，也可說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這個曾在世界上叱咤風雲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大黨，倏爾解體了，人們在驚訝之餘，不免要追尋它的原因，吸取一些教訓，或者對其未來做一些揣測。本文先對蘇共崩潰的原因，作一番介紹與分析。

一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領導並為它寫了「共產主義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和「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的組織，名稱是「共產主義者聯盟」(League of Communist)。第一國際、第二國際旗下的政黨，都不叫共產黨。一八九八年成立的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這個黨於一九一八年三月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將黨名改為俄羅斯共產黨，下加註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 的「布」字，即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 簡稱俄共(布)。

蘇聯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U.S.S.R.) 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宣布成立，為資配合，俄共(布)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決議改稱「全聯盟共產黨」，仍加「布」字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 簡稱聯共(布))。一九五二年十月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決定改稱「蘇聯共產黨」(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 簡稱蘇共)，不再加「布」字。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三十多個國家的左派政黨與組織的五一名代表和一些國家所派遣的觀察員，由列寧領導在莫斯科舉行國際共產主義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第三國際。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蘇聯共產黨何以失敗？

加入國際的廿一項條件，其中規定凡加入國際的政黨，必須改稱共產黨，故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各國的黨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並為「共產國際支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開始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各國共產黨在思想、組織、策略原則等方面，必須布爾什維克化。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奉史達林為「世界革命最高領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y），已拓展為「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socialist family of nations），這個家庭的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方面，也都蘇聯化。第三世界的若干國家，也吵嚷嚷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說，從俄共（布）經聯共（布）到蘇共，一直影響著（有時甚至是支配著）世界的左翼運動，應不為過。

二

大陸人士李驥在他的文章中說：

一九一七年，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十月革命在僅有廿四萬黨員的布爾什維克的堅強領導和工人階級及人民群眾的英勇鬥爭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偉大勝利。但是，在取得政權並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七十四年之後的一九一九年，卻發生了驚嚇世界的七十二小時的「八·一九事件」，促使蘇聯急速地向解體方向發展。擁有一、九〇〇多萬黨員之眾的蘇共，由總書記說了一句解散的話，最高蘇維埃會議勒令它停止活動，十四個共和國宣布它為非法，沒有一點較為強烈的反抗，全黨就陷於土崩瓦解之中。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只是葉爾欽等四個人一紙聲明，「無亡矢遺鏃之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變成了歷史名詞。^①

王友群和胡昊的文章裡也說：

七十四年前，十月革命的勝利震撼了全世界，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七十四年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經過短短七十二小時的事變便急劇走向解體了，近一五〇〇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隨著一個人的一紙命令就被無聲無息地解散了。^②

註① 李驥，「從蘇聯解體看蘇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河北師範學報社科版（石家莊），一九九二年第三期，第一、一五、五一頁。

註② 王友群、胡昊，「正確總結蘇聯解體的原因和教訓——中國國際共產史學會一九九二年年會述評」，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一九九二年第四期，第七九、八二頁。

這些話都帶有悲憤和無奈的慨嘆。從十月革命奪取政權算起是七十四年，從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之日算起，已將近百年，之後，一個歷史悠久、組織嚴密、影響鉅大的蘇共就黯然走下歷史舞台，一些憂心忡忡的共產黨員，又怎能不悲憤、慨嘆呢？

然而，何以致此呢？李驥的文章裡問：「毛病究竟出在哪裡」？他是從共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著手分析，他提出的是：黨在政治上沒有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沒有真正成爲國家的主人；官僚主義、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沒有正確處理民族之間的關係；理論實踐不統一等等。

王友群和胡昊的文章，是關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至十七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舉行的「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一九九二年年會的評述，雖然題目用的是「蘇聯」二字。實際上，「蘇聯」解體的原因，就是「蘇共」解體的原因。反過來說也一樣，因爲「蘇共」和「蘇聯」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學會的年會中，對於蘇聯（共）解體的原因，有多種看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提出六對十二個方面的原因：內因與外因，內因爲主；近因與遠因，近因爲主；主觀與客觀，主觀爲主；宏觀與微觀，宏觀爲主；上層與下層，上層爲主；深層與淺層，深層爲主。

在王、胡的文章中，提到被與會代表贊成和肯定的看法是：蘇聯解體是其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方面危機總爆發的結果，原因多種多樣，但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原因，是執政黨蘇共嚴重脫離人民群眾，導致人民失望不滿、怨恨，最後被人民唾棄。文章指出，與會的大家一致認爲：「蘇聯垮台得這麼慘，首先就垮在蘇聯共產黨的手中」。

文章提出蘇聯解體的最大啟示是：必須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斷改革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改革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和組織建設，增強黨的凝聚力、戰鬥力。文章說，代表們都同意：「不能以階級鬥爭、反自由化或反和平演變爲中心來代替或沖擊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這幾句話好像是對中南海說的。

三

前蘇共中央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聯人民代表、著名歷史學家、現俄羅斯社會主義勞動人民黨主席之一的羅伊·麥德維杰夫（R. A. Medvedev）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赴中國大陸訪問。一九九二年九月廿六日和廿八日上午，分別在東歐中亞所和中央黨校作了報告，廿六日下午參觀首鋼並進行座談。大陸人士言實，將麥德維杰夫報告和座談時的講話

蘇聯共產黨何以失敗？

，綜合整理後予以摘錄發表。

麥德維杰夫指出，很多以前的蘇共黨員認為，蘇共遭到嚴重的失敗，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應負很大責任，因為他們禁止了蘇共的存在。麥氏則認為，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是起了作用，但主要原因是蘇共的脆弱和它自身存在的缺點造成的。他說：

有一個事實說明蘇共確實是失敗了。一九九一年八月廿三日，當葉爾欽宣布禁止蘇共活動的命令後，立即有成千上萬的人跑到蘇共和俄共辦公大樓的廣場上，把辦公大樓圍困得水泄不通。這些人不是來保護共產黨的，而是對共產黨的幹部進行侮辱、唾罵和圍攻。如果沒有幾千名警察和保安人員組成一個通道把他們營救出來，這些人就會受到傷害。中止蘇共活動後，全國沒有一次罷工或遊行提出保護蘇共的口號，更沒有一次為要求保留黨而舉行的罷工或遊行活動。這說明黨喪失了威信，人民不再尊重它。^③

其實，蘇共的威信失墜，不自今日始。布里茲涅夫時期，蘇共黨員曾達一、九〇〇萬人。一九八八年四月時的統計是一、九四六萬餘人。據李驥說，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兩年多，蘇共黨員就退了三四百萬人，其中約百分之五十是工人黨員（前引李驥所說蘇共解散時擁有一、九〇〇多萬黨員是不妥的——筆者）。領導幹部孑然孤立，悄然無聲，不敢到群眾中去。如此，則麥德維杰夫所述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麥德維杰夫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指出蘇共失敗的原因是：（一）蘇共一直沒有解決與農民的關係；（二）黨沒有制定出正確的民族政策；（三）外交政策出現了嚴重的錯誤；（四）沒有找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正確模式；（五）黨沒有同知識分子建立起正常的關係。這些都是對的，但是我們該進一步探尋，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呢？它不會是偶然的，也不會完全由於個人的原因，雖然這些也是存在的，但這些絕不是主要原因。要追根究柢去搜尋真正的原因，話就不能不從遠處說起。

四

大陸人士丁篤本發表過一篇「列寧建黨思想探源」的文章，指出三個重要領域，即：政治綱領、組織原則和群眾路線。關於政治綱領，簡化丁篤本的話來說，第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以暴力革命手段（反對第二國際的議會道路）奪取政權，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二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黨的基本任務；第三是把黨綱具體劃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制定由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路線。

註③ 言實，「羅伊·麥德維杰夫談蘇共失敗的原因和蘇中改革」，國際共運史研究（北京），一九九二年第四期，第六〇—六二、二七頁。

關於組織原則，強調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建黨組織原則。丁文指出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建黨組織原則，不過更突出集中制，主要依靠集中制把黨組織起來。又指出，列寧推崇黨的集中統一的思想主要是批判地繼承俄國革命民粹派政黨的組織原則。

關於群眾路線，丁文指出：第一，列寧在堅持職業革命家在黨組織中的核心作用的同時，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第二，列寧注意借鑒吸收第二國際在加強黨同工人群眾及工人組織的聯繫方面取得的成效，但更強調黨對工人組織和群眾運動的領導。

列寧的黨乃是少數職業革命家（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黨，它以先鋒隊（vanguard）的姿態，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於奪取政權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事實上是先鋒隊專政，這裡就會產生誰是真正的國家主人和黨群關係的問題。

民主集中制乃是有餘、民主不足，實際是個高度集權的制度。可是國家的權力集中在那裡呢？大陸人士王正泉說，列寧提出過兩項基本原則：一是要堅持共產黨對政權機關的領導，二是要明確劃分黨政機關的職權。^④筆者看，這兩項原則就互相矛盾，正如同他主張一切決策要通過黨的政治局，又主張「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其結果就弄成黨政融合、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黨是依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是黨員代表大會，大會閉會期間由蘇共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of CPSU）代行其職權。中委會每半年舉行全體會議一次，中全會休會期間，由政治局（Politburo）和書記處（Secretariat）行使中委會職權。中央除設政治局、書記處和黨監察委員會（Party Control Committee）外，另設許多和政府部會對口的部，這些黨的機關代行行政機關的許多職能。由於書記處處理黨的日常工作，每一名書記都有其主管的責任範圍，負責監督中委會下附設的各部。因此書記處就成為黨的最高執行機關。書記處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同為中委會選出，依照往例，須具備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經歷者，才有登上總書記或第一書記寶座的資格。

黨的書記處於一九一七年即已創建。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後第一次有列寧參加的中央全會上，由加米涅夫（Lev B. Kamenev, 1883-1936）提議，在全體中央委員沒有反對意見的情況下，通過了設置俄共（布）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職務和由史達林擔任斯職的決定。然而，八個月後即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列寧在他口授的記錄中說：「史達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達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這其間的經

註④ 王正泉，「從蘇共二十八次看蘇聯黨政關係的根本變化」，外國政治·國際關係（北京），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二一八頁。

過，王祖奇在他的文章中有過較詳的析述。^⑤

史達林擔任總書記直至一九三四年。同年一月廿六日開始的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為抑制史達林權力過於膨脹，曾廢除總書記頭銜，成為三十年代大整肅原因之一，而實質上並未能阻止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獨裁。

一九五三年九月，黑魯曉夫當選第一書記，於一九五六年二月發動反個人崇拜的貶史運動。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B. Tito, 1892~1980）立即指出，那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取消總書記頭銜，無礙於史達林執行總書記的任務。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史達林又出任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一九四六年改稱部長會議 Committee of Ministers）主席（總理）。黑魯曉夫也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罷黜布加寧（Nikolay A. Bulganin）而自兼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他和史達林同樣，領導中央書記處，召開中央主席團（政治局）會議，主持部長會議。蘇聯的重大政策，均由中央主席團和部長會議聯席會議決定，他和史達林一樣集大權於一身。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主持的蘇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又將中央主席團恢復政治局名稱，第一書記又改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身為總書記，於一九七七年繼包戈尼（Nikolay V. Podgorniy, 1903~83）之後，自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國家元首）。一九八〇年十月，總理柯錫金（Aleksy N. Kosygin）辭職，由布親信吉洪諾夫（Nikolay A. Tikhonov）繼任，所謂「三頭馬車」（Troika）式的集體領導即成過去，大權又集中於布里茲涅夫一身。

五

誠如丁篤本所言，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直接組建和領導過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共產黨的建立方面，不能不歸功於列寧。列寧建立了一個機關化、官僚化、金字塔形高度中央集權的黨，實現了民主集中制，卻遠離了群眾路線。這或許不是列寧的本意，但事實確是如此。

列寧的黨不曾放棄它的政治綱領，就是依靠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恩格斯寫於一八七二年五月至一八七三年一月的「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一文，最初使用「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一詞。^⑥不過，C. A. 蘭佐夫卻認為對一個站在客觀立場的研究人員來說，「不僅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

註⑤ 王祖奇，「關於俄共（布）中央總書記設置的幾點認識」，國際共運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二六二至二九頁。所引原註：列寧全集，第二版，第四三卷，第三三九、三四〇頁。

註⑥ 徐博潤，「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何時開始使用『科學社會主義』一詞」，光明日報（北京），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第三版。

理從一開始就帶有天真浪漫和烏托邦的性質，而且最初曾正確反映了社會現實的一些構想也同樣逐漸失去了自身的意義。」^⑦ B. C. 維戈茨基和 H. G. 費多羅夫斯基的文章也說：「現代社會不能按一百年前制定的計劃生活和完善。」^⑧如此說來，蘇共堅持那樣的政治綱領是否得計，就大大值得懷疑了，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並不科學。

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方面的最大特徵，是主張公有制和實行有計畫有組織的生產，或者說依照預先規定的計畫來進行社會生產，那就形成中央計畫經濟。

公有制現階段為國家所有，依共黨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說，這個制度的最大問題是產權不明，沒有人為國家財產負責。另一方面，正像中共所說，大家把國家財產當作唐僧肉，誰都想吃一口。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可就難了。

馬恩設想用統一的計畫安排社會生產，主要是避免無政府狀態的自由競爭。可是沒了競爭，也就很難有進步。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計畫將愈來愈困難。早在五、六十年代，蘇聯安氏飛機設計人安托諾夫（Oleg K. Antonov）就說過，根據基輔數學家們的估計，僅僅烏克蘭一個共和國，要擬訂一年的工業計畫，就需要動員全世界的人口，流上一千萬年的汗。^⑨

曾經一度嚮往蘇聯的尤金·李昂斯（Engene Lyons）指出，蘇聯最大的二〇萬個企業大約生產二、〇〇〇萬種不同的物品，但國家計畫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ttee，簡稱 Gosplan）僅對一八、〇〇〇種物品（約占總數千分之一弱）的生產提出長期及年度的指示，其餘統統由次級的全國性、區域或地方性的計畫機構在處理。這可能都處理得妥當嗎？不能無疑。

李氏又指出，根據官方的統計，蘇聯中央計畫機構和地方分支機構的行政人員共計一三〇萬名。其實除此之外，還有幾百個區域性和地方性的委員會、局及黨委員會。一些蘇聯問題專家估計，全部計畫行政部門的人員有一、二〇〇萬人。必須說明，李氏所說的是一九五、六十年代的情形，此後人員復有增無減。

國有財產或依照共黨稱為生產資料，應由國家管理，於是就把工農企業及其他部門，分屬地方或中央各部，就造成政企不分，企業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品。

註⑦ 蘭佐夫，「革命理論的方法論問題：馬克思主義遺產與當代」，俄列大學報第六類（一九九一年第六號，俄文）第二八〇頁。轉自國外社會科學快報（北京），一九九二年，第七期，第三五〇三六頁。

註⑧ 維戈茨基、費多羅夫斯基，「根源（方法論的迫切問題）」，俄蘇共歷史問題（俄文），一九九一年，第九號（俄文），第六八〇八二頁。轉自國外社會科學快報，一九九二年，第七期，第三四頁。

註⑨ 轉自原子林二郎，「革命五十週年的蘇聯」，時事週刊（東京），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出版。

由國家計畫、管理，以行政命令指揮運作，就成為命令經濟。可是，人是不能單靠命令勞動的。靠命令指揮要求有效，就需要監督，監督者背後還要監督，這樣層層監督，有人說就是動員三千大千世界的全部警察也不夠用。

由於計畫、管理、監督處處需人，共黨國家就形成臃腫的官僚機構、龐大的官僚群和深厚的官僚主義。

從麥德維杰夫的講話中，可知行政命令式的經濟就是政治家坐在辦公室裡解決經濟問題。蘇聯在一九二、三十年代，廠長要聽黨的；四五十年代，又要聽祕密警察（KGB）的；五六十年代，要聽黑魯曉夫的，他說要種玉米，大家就得都種玉米。麥氏以為政治家應該集中精力去解決政治、外交和社會問題，不應該把廠長、專家叫到自己的辦公室指示人家該幹什麼，不應該幹什麼。可是，事實正和麥氏所說的相反。

前蘇共中央書記李加契夫（Ye. K. Ligachev）在「在克里姆林宮和老廣場」的回憶錄中說，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是：

完全無以復加的典型的黨的機關工作者。幾十年來他一直坐在辦公室裡工作，與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有著相當的距離。^⑩

其實，何止契爾年科一人如此？據麥德維杰夫說，過去蘇聯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各種經濟模式，來解決經濟問題，然而他們沒有參加過生產勞動，也沒有領導過一個工廠。俄羅斯代總理主張激進改革的蓋達爾（Yegor Gaidar）曾去視察一個工廠，他走到高爐前面問這是什麼，人家告訴他這是高爐，而他卻說：「我以為這是糧倉呢！」可知政治家在辦公室裡解決經濟問題，難免有外行領導內外之譏。而所謂經濟發展、經濟改革也都大有問題。

六

共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最後卻脫離了群眾，一則是它已變成高高在上的人民群眾的主人，一則是某些政策使然。共黨最大的群眾路線應該是所謂工農聯盟，沒有農民參加，在工業不發達、工人階級不占多數的俄國，革命就不易成功。可是革命成功後共產黨發展經濟的政策路線，卻不利於農民。麥德維杰夫指出，在農民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俄國，黨把自己看成只是工人階級的黨，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找到解決好同農民關係的好政策。一九一八年秋，黨犯了一個錯誤，實行餘糧收集制，脫離了農民，這也是發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國內戰爭的原因之一。國內戰爭期間，黨不僅反對富有者，而且還

註⑩ 轉自「從蘇聯解體看蘇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反對中等階級，它依靠的只是貧窮的階層。後來列寧發現餘糧收集制對農民損害很大，才對農民讓步，提出新經濟政策，否則在一九二一年時黨就會受到嚴重打擊而退出歷史舞台。一九二九年史達林搞農業集體化，又導致黨和農民之間的大分裂。史達林始終沒有處理好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關係，其後果到現在仍很嚴重，農民手裡有糧食不賣給國家，要求黨賠償他們七十年的損失。

馬克思主義確有重工輕農之嫌，蘇聯急求工業化，更以農業為犧牲，農民當然不願再作共黨的「同盟軍」。那麼，工人階級又如何呢？正如同李驥所說，共產黨員、工人階級不起來保護黨和領導機關，卻紛紛退黨。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退黨的三、四百萬人中，半數是工人黨員。

十月革命後成立的政權，原本稱為工農政府。如果工農都棄它而去，這個政權的基礎自然就會動搖。

麥德維杰夫指出，蘇聯的各民族之間，各民族與俄羅斯之間有很多抱怨，產生了離心力。這種強大的離心力把蘇聯拖垮了，把蘇共拖垮了。他把這歸咎於黨沒有制定出正確的民族政策。

馬克思主義把世界分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陣營（兩條戰線），認為所有無產階級都利害一致，主張以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取代民族主義（Nationalism），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產黨宣言」）。李驥在文章中引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說：「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隨之消失」。又引史達林的文章說，在資產階級民族隨著資產階級消滅而消滅的廢墟上，「社會主義民族產生和發展起來，這種民族比任何資產階級民族都團結得多，因為他們沒有那些腐蝕資產階級民族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且它們的全民性遠遠超過了任何資產階級民族。」「在我們這裡，在我們國家中，民族壓迫早已消滅了。」（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九三—二九四頁）筆者再補充引述一九七七年布里茲涅夫憲法前言中所謂「社會主義之社會關係業已成熟，各階級與社會階層相互接近，各民族、各部落在法律與實際平等及兄弟合作之基礎上，已產生人類新興之歷史共同體——蘇維埃人」。其實，這些話所說的都不是事實。多年來蘇聯的民族政策，是以國際主義掩蓋著民族壓迫，恩怨愈積愈多，離心力愈來愈強，一有機會就會總爆發，沖垮了蘇聯和蘇共。這也再次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性質之不切實際。

麥德維杰夫指出，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的主導思想是搞世界革命。麥氏認為這也是空想。他說，後來蘇聯的外交政策演變成對外擴張政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搞成了超級大國政策，想在莫斯科解決國際共運中的所有問題。史達林、墨魯曉夫、布里茲涅夫，都想在世界各地找自己的代理人。這是國際共運分裂的一大原因。這種外交政策，一方面遭到各國內部的反抗，同時蘇聯也耗資巨大，使人民生活長期不能提高。他的意思是說，蘇聯搞冷戰、搞革命，耗費了巨額的軍費與經費，也拖垮了蘇聯自己。

七

該談談蘇共改革中的失誤。

在興吾譯的「俄共中央書記甘久諾夫撰文談改革中的七個失誤」一文中所指出的七個失誤是：

第一，改革的領導者的重大錯誤在於：改革的主要意圖未能實現，即未能通過發揮人民的全部創造力來發掘社會主義潛力，勞動集體、黨組織、經濟領導人、廣大知識分子被排除在外，：辦事公式化和心血來潮，缺乏組織才幹。

第二，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誤，想一舉解決所有問題，一遇挫折，便匆忙草率地改變主攻方向。

第三，改治改革本身一開始就「路子不對」，本應先求得更高的管理和組織水平。沒有先搞民主化，更新黨，使它適應當前的條件，依靠黨進行必要的改革，而是一開始就人為地匆忙地培植政治多元化。

第四，中央、共和國和地方權力機關最近一次的選舉是在複雜的社會經濟形勢下進行的。只能把這樣的選舉結果看成是黨的理想和組織狀態惡化的嚴重信號。

第五，最近有人一個勁兒地勸說我們相信，似乎輿論工具不過是反映現實的一面鏡子，不是影響人們思想和情緒的強有力的手段。很難說在這種勸說中什麼成分更多——是過於單純還是在耍滑頭。

第六，有人還沒有意識到為什麼外部勢力偏偏只對我國（蘇聯）事態這樣感興趣。

第七，：以反對舊體制為借口來破壞統一的全蘇社會管理和國家管理結構和監督機構。^①

甘久諾夫的分析不無參考價值，但他是站在共產黨員的政治立場上講話的。他的文章發表在蘇聯解體之前，他認為當時的改革危機已成爲全面危機，這主要是主觀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各級領導人的外行、缺乏政治意志和道德造成的。

如此說來，戈巴契夫應該負最大責任，因爲這場由上而下的改革，是他發動並領導的。麥德維杰夫說：

：當年黑魯曉夫和布里茲涅夫也想改革，戈巴契夫更堅決，但他沒有正確理解改革，也沒有制定正確的改革方向。民主化對我們來說是必要的，但不能在二三年內就完全實現民主化，要有一個過程。因爲三分之一的人是在集權體制下生活過來的，他們形成了心理上的模式。搞多黨制也要有個過程，戈巴契夫搞得太急了，結果不但沒有造成繁榮，反而

註①

摘自興吾譯，「俄共中央書記甘久諾夫撰文談改革中的七個失誤」，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七—四一頁。該文原載蘇聯蘇維埃俄羅斯報，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

使社會的疾病浮到表面上來了，使各種矛盾爆發了。對於過去的罪惡是要揭露，但更應該解決它。我們的社會科學沒有能力解釋這些，這就給敵人可趁之機。他們攻擊七十年來的社會主義成果，而蘇共沒有力量反擊，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丟掉了，出現了黨失控的進程。這也是蘇共失敗的一個原因。

曾經在蘇聯生活了數年，是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又曾擔任義大利共產黨負責國際事務的書記，義大利議會議員的安東尼奧·魯比於一九九〇年夏發表與戈巴契夫的會晤：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納塔和奧凱托與蘇共領導人的會談一書，^⑫其中談到在一九八八年三月義共與蘇共的高級會談中，戈巴契夫承認，一九八五年春他剛上台的時候對改革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當談到他們滿足於「部分改革」而不是「革命性的復興」這一事實時，戈巴契夫明確表示：

事實是，即使我們感到了這些問題，但我們對本國社會並不了解。
魯比描述了義大利共產黨人對此作出的反應是：

一個執政七十年的黨通過它的最高領導人之口承認對自己社會的真實情況毫無所知，而這個黨卻宣稱對這個社會的一切生活領域始終起指導作用。^⑬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對自己的社會並不了解，最初只想「部分改革」，以後才要「革命性的復興」，那就難怪這項改革沒有一套完整、詳盡而明確的計畫，而是像中共的術語所說：「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一遇挫折就轉彎。想要成功，難矣哉！

就改革的過程言，例如一九八九年三月蘇聯選舉，成立人民代表大會，改組最高蘇維埃為人代會的常設機關，目的是恢復蘇維埃的全權，黨的機構也放棄按管理部門相應劃分的做法，不再設或減少與政府部會對口的部，將權力移交給政府。戈巴契夫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他的學長魯基揚諾夫（A. Lukiyanov）當選第一副主席。他雖則依然掌最高權力，但他身兼共黨總書記，不能不受黨的牽絆。而改組後的最高蘇維埃，由於當初設計不周，成為議而不決，決而無力執行的機構，延誤了很多重大問題的處理。

一九九〇年為實行黨政分開，蘇聯採行總統制。戈巴契夫把黨的中央政治局架空，將最高決策權力移往總統委員會，他身為總統依舊大權在握，然而不久總統委員會也取消，原先的企劃又大打折扣。

註⑫ 從一九八四年六月戈巴契夫參加義共領導人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葬禮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他訪問羅馬的五年多時間，戈先後與義共領導人納塔（Alessandro Natta）和奧凱托（Achille Occhetto）進行了七次最高級會談，當時安東尼奧·魯比擔任翻譯。

註⑬ 魯比所述，俱轉引自日·泰默曼（德國科隆聯邦研究所學者），「戈爾巴喬夫的誤區」，王業龍譯（題目有改），《國外社會科學信息》（北京），一九九二年，第十四期，第三〇—三三頁。

將權力由黨轉移給政府，實行黨政分離，原則上並無錯誤。但都因為計畫不周，遇阻轉彎，致使舊權力基礎動搖，新權力基礎未固，遇到經濟、民族等重大問題無力解決，而招致嚴重後果，戈巴契夫應尸其咎。

戈巴契夫上台之初，大刀闊斧整頓黨政機構，刷新人事陣容，表現得相當果敢決斷。可是愈到後期愈顯得優柔寡斷、猶豫不決，這或許和他的出身與地位有關。他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依靠黨爬升到最高地位，因此，當他將權力由黨移往蘇維埃，把最高決策機構由黨移往總統府時，他仍然兼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他既身為黨的總書記、國家的總統，即使瀕臨絕境，也不願見共黨崩潰和國家解體。這就使得他不能不左遷右就、委曲求全，是可以理解的。當他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時，又呼籲有良好的黨員重結新黨；當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發表獨立或主權宣言時，他仍在努力籌劃新聯盟。在此情況下，他是果斷不起來的。

細讀前引魯比書中的要點，可以體會得到戈巴契夫明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的內容大部分已經過時，當前是科技革命、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新時代，但他仍要回歸列寧；他明白表示蘇聯改革不應該作為一種模式向其他國家或地區輸出，蘇共指揮東歐其他兄弟黨追隨其政治路線的時代已經過去。又說：「每個國家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它應該以它認為合適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可是，他仍然試圖說服共支持他召開一次共產黨世界大會。

戈巴契夫要為蘇共和蘇聯改換新裝，卻又捨不得丟掉共產黨的舊襯衫，那是他最大的失敗原因所在。總的來說，蘇共失敗在於它的政治綱領、組織原則、群眾路線和改革失誤之中。